

WEN HUA JI YIN YU SHE HUI BIAN QIAN

文化基因与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向的民族文化解析

赵传海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WENHUA JIYIN YU SHEHUI BIANQIAN

文化基因与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向的民族文化解析

赵传海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开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基因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向的民族文化
解析/赵传海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649-0137-0

I. ①文… II. ①赵… III. ①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研
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4529 号

责任编辑 李景奇

责任校对 王可佳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市精彩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自序

20世纪90年代,我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不同,则不甚明了。随后,我开始多视角地追问这个问题,由于受当时“文化热”的影响,在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维度方面,先后发表了《李大钊对国民性的反思》、《历史制约论及其现实意义》、《毛泽东对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贡献》、《道德传统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等论文,逐步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基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后,我在参与《与时俱进解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能力论》等课题研究和书稿撰写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在此基础上,2005年我有幸进入天津师范大学求学,很快就把研究方向锁定在文化基因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上,之后,主持完成了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发挥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课题《文化基因与中国社会走向研究》获得了河南财经学院重点资助,完成了此书稿的初步写作,赢得了一些专家的好评。

我在探讨中国固有文化元素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构建、变迁的关系时,发现用“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概念难以涵盖和阐

明相关问题,所以,借用了“文化基因”这个舶来品。我把文化基因界定为“可以被复制的、鲜活的文化传统和可能复活的传统文化的总和与统一”,进而揭示中华文化基因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所产生的“轨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化基因养成了中国人的价值偏好,构筑了社会发展的依赖路径,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感召下,助推现代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赋予了中国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特色,实现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我不仅试图揭示文化基因轨制社会变迁的逻辑机理,而且试图在这个视角下诠释中国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独特性及发展趋势。反观过去,丰富而朴素的社会主义文化基因始终流淌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滋润着历代中国人的心田;及至现代,深受中华文化传统影响的中国人,心灵深处原始地储藏着许多“早已有之”的社会主义文化基因,在外相与内形上与科学社会主义会通,使中国人在20世纪前期顺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20世纪后期捍卫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造就了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在民族疆界没有消除之前,社会主义已经并将继续结缘民族主义,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世界未来意识形态激烈竞争中,我们应该努力保全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国文化传统,整合中华文化基因,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素无鸿鹄之志,更无旷世雄心,但作为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在保持冷静思考的前提下,也采用了诸多激昂文字,意在冲破学院派的呆板牢笼,避免表述的玄奥生涩,增添阅读的审美趣味。是也非也?读者自有评判。

目 录

自序	(1)
引言 历史投影的基本问题	(1)
一、解读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向的新视角	(1)
二、文化基因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概况	(6)
三、文化基因轨制社会变迁的基本研究思路	(10)
第一章 文化基因的社会功能	(16)
一、文化的基本内涵及一般特征	(17)
二、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辨析	(25)
三、文化基因的含义与传承特性	(33)
四、文化基因的社会功能	(42)
第二章 国民性改造与文化回归	(48)
一、历史决定与主体选择	(49)
二、国民性改造的历程	(54)
三、国民性改造与文化基因的复活	(60)

四、国民价值偏好与社会变迁的路径依赖	(74)
第三章 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化基因	(81)
一、中西文化关于社会组织的思维分野	(82)
二、中国固有的社会主义文化基因	(88)
三、社会主义文化基因被激活后的社会轨制作用	(97)
四、中华文化基因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读	(104)
五、中华文化基因对中国共产党的塑造	(117)
第四章 承继遗产与中国民主革命转轨	(126)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	(127)
二、中国共产党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方针的确立	(134)
三、中华文化基因在中国革命中的表现与作用	(142)
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模式	(159)
第五章 改造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	(167)
一、从思想改造到文化革命的震荡	(168)
二、中华文化基因在新中国屡次浮现	(176)
三、中华文化基因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力轨制	(186)
四、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197)
第六章 弘扬传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6)
一、中国传统的强劲张扬	(207)
二、中国传统张扬的社会原因	(217)
三、传统张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校正	(227)
四、激活和培育和谐社会文化基因	(235)

第七章 从民族社会主义走向世界社会主义	(244)
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变奏	(245)
二、社会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250)
三、社会主义从民族到世界的两个发展阶段	(258)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挺立世界社会主义	(265)
结语 护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	(271)
一、反思毛泽东的一个重要主张	(272)
二、梳理与整合中华文化基因	(276)
三、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285)
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90)
参考文献	(300)
后记	(310)

引言 历史投影的基本问题

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Philip Bagby)在其学术生涯中写过一本较有影响的著作,那就是《文化: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旨在为历史学与文化学的沟通建立桥梁。他认为,在英语世界里,众多学者纷纷求之于人类学帮助我们理解历史。这门科学趋向于分为两个学科——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其中,活跃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们的研究,集中于文化观念,侧重于传统价值观念的时代影响。无论巴格比的观点如何,但是他清晰地描绘了人类历史的一种独特现象,即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并准确地使用了“历史的投影”这个概念。深入研究的文化基因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借用这个概念,进而说明中华文化基因对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向的轨制机理。

一、解读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向的新视角

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

演进的基本核心。”^①在历史学家的视野里,对此往往有不同的回答,他们可能更关注既定的社会制度得以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在我看来,这些精辟论述似乎还不能从根本上诠释中国为什么自然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为什么自觉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而中华文化基因可能在这一伟大制度变革和社会变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尽管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众多的研究和论述,但是对一些最基本问题的论证,还不能十分令人满意。特别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独特性”、“发展性”的研究,学术界要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注解,要么是从中国近代以来工业经济发展中探求奥秘,要么是从世界时代发展环境中寻找依据,其结论很难令人信服。江泽民要求加大对“三大规律”的研究力度,提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命题,也说明了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和拓展。应该承认,学术界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如戴舟主编的由《求是》课题组撰写的《九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一书,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历史的必然产物。余金成用15年的时间撰写的《社会主义的东方实践》一书,别出心裁地论证了中国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转变成实际制度所经历的一次质变。肖枫完成的国家社科研究规划课题《两个主义一百年: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力图通过社会主义在一百年中的经历和遭遇、发展和挫折,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前途命运。其他诸如吴江撰写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张光明撰写的《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① [美]道格拉斯·诺斯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123、13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撰写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高放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赵明义主编的《当代社会主义》、季正矩等主编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前沿对话》、杨宏雨撰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多维审视》、黄宗良和林勋健主编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都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其中无不关心中国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精心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但是,很多学者在描绘了中国社会主义“是这样”等一系列重大的显形问题时,却很少有人阐明中国社会主义“为什么是这样”、“将来是什么样”等同样重大的隐形问题。

“20 世纪的一个最大功绩,是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①纵观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三件大事震撼世界:第一件是 20 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展示了气势磅礴、光芒万丈的辉煌;第二件是 20 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事业从高潮转向低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了,一时间“社会主义失败论”甚嚣尘上;第三件是在 20 世纪最后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挺立于世界潮头,创造了社会主义一枝独秀的耀眼奇观。在欢欣鼓舞和痛心疾首之后,留给人们的是历史的回忆和深深的思考。即经济基础落后的中国为什么能够先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后为什么还能够存在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将走向何方?面对这些重大困惑,用“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主义的工具,是难以破解的,必须另辟蹊径。因此,我希望从民族文化的视角予以解读。

我之所以要从民族文化的视角解析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向,

^① 王全书、赵传海、薛安泰、朱春奎:《与时俱进解读》,第 11 页,红旗出版社 2006 年版。

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量：

其一，多视角地研究和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习惯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研究路径，从经济基础上寻找历史变迁的根本原因。从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开始，到当今的一些教科书，不少都是这种范式的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导入，开辟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天地。但是，也有一些人陷入了“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泥潭，成为恩格斯曾经批判过的“经济主义者”。学术界关于中华文化基因对中国社会主义轨制的研究，至今没有超越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对“文化大革命”起因分析的水平。近年来，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相当全面、深刻，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诠释，已经相当丰富、精妙。然而，从文化视角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合法性、独特性、长期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运用中华文化基因解读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向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从文化基因对社会制度轨制作用的新角度，努力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特殊性、长期性和未来趋势，批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可能是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一条捷径，也可能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许多理论问题的一把钥匙。

其二，多方位地护卫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正如梁漱溟所言：“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将枝叶去掉，要向咽喉去着刀！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①面对这种严重威胁，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发出了“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吁。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挖掘中国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5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固有文化资源,激活优秀文化基因,不仅对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而且对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大有帮助。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一种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形态,是一定时空内人们共同心理和社会理想外化的结果与表现。超越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二维思维方式,坚持把传统与现实统一起来,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文化传统,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努力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对于巩固、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多层次地拓展中华文化基因对现代社会影响的研究领域。1981年,我考取了河南大学史学专业,史学培养了我的历史意识,增进了我的历史知识。2000年,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专业硕士学位,学习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2005年,我进入天津师范大学攻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博士学位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些老师非常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关系,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诸如董四代撰写的《传统理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同传统与社会主义》,荣长海撰写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王燕京撰写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王兰垣、余金成、王燕京合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论》等论著,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有所论证,其中许多观点使人茅塞顿开,让人倍感新鲜。近年来,我把自己的学习心得整理成文,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与时俱进与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与实现中原崛起》、《毛泽东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贡献》、《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文化观》、《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因》、《论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等论文,逐渐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悠久历史在现实社会的“投影”。这些初步研究及其成果,为我继续探讨中华文化基因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进一步激发了我

关注这个问题的浓厚兴趣。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选择这个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要做的题目太大了,要读的文献太多了,要驾驭的体系太宽了,要涉及的领域太广了,我诚惶诚恐、忐忑不安。但是,当我阅读文献的时候,惊喜地发现,不仅梁启超、胡适等近代思想大家把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类比于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季羨林、庞朴等当代著名学者也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相关性。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决定以中华文化基因为核心理念,解读中国社会主义路径走向,进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独特性和长期性。

二、文化基因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概况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史上,从马克思到列宁,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认识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反观固有文化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20世纪以来,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越来越关注文化因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文化史与宗教特质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在世界学术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Philip Bagby)的《文化: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试图精确地为历史、文化、文明寻找一套首尾一贯的、切实可行的概念体系,评析文化的功能与目的;沉睡编著的《文化中国——剧变背景下的中国前沿论辩》,黎鸣主编的《中国的危机》等著作,纷纷把触角深入到文化基因与中国社会互相关联的环节上,渐次开辟了学术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出现了研究中国传统

文化和中国现状的热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之下:现代化视角下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全球化视角下传统文化的世界价值。如庞朴著的《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叶圣陶研究会编辑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唐君毅著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余英时著的《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宋仲福等著的《儒学在现代中国》等,均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国现状的研究,集中于两个领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解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问题的分析。诸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和《理论热点面对面》、王伟光主编的《若干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解读》、王永贵等编著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刘志光著的《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解读》等,均属于这一类的研究成果。

然而,把中华文化基因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状态直接联系起来的研究成果,则屈指可数。就我所看到的资料而言,国内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1)王燕京著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主要论述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关系。(2)中华孔子学会编的论文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分析了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3)于琨奇、花菊香主编的《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主要反映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方式中的影响和作用。(4)王保庆著的《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主要分析了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影响与作用。(5)董四代撰写的《大同传统与社会主义》和《传统理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梳理了中国大同思想的演进及其时代表现和价值。(6)王凤贤主编的《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论述了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7)李瑞环撰写的《学哲学用哲学》,主要论证了弘扬传统文化尤其是弘扬“和文化”的重要思想。(8)俞思念在《社会主义研究》上发表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论纲》,主要分

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与统一。(9)董四代在《岱宗学刊》上发表的《古道今释论大同——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解读》，主要阐明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萌芽形式。(10)胡海波、魏书胜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从“和合”文化传统到“和谐社会”理想》，主要阐述了“和合”文化传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心理作用和社会功能。等等。这些成果表明，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状态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外在契合，但多是初步的、零碎的论证。

国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发现专门论著，只是散见于其他著作之中。例如：(1)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多次追问了文化类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2)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多方位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性特点。(3)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很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遗产和成就，特别注重观察中国“关于国家权力性质的传统思维的某些基本观念”^①。(4)日本学者高桥进的《中国思想在世界上的现代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进行了较充分的阐释。(5)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的《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用了不少笔墨阐述“中国古典哲学对现代中国的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均对中华文化基因与中国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有所涉及，但多为只言片语，不成体系。

关于中华文化基因及其社会功能的研究，无论国内国外，都是

① [美]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刚开拓的新领域,可以炫耀的成果更少。1976年,英国习性学家查理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一书,杜撰了一个新概念 meme,用以说明文化传承中的基本单元,用以表达一个“文化传递单位”的概念,同时又带有“模仿”的意思。中国在跨入21世纪之时,才有南京政治学院教授毕文波、北京大学教授王东、江苏大学教授钱兆华等几位专家偶尔发表一些关于中华文化基因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广辉撰写的《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前轴心时代的史影与传统》一文,可列为关于中华文化基因的上乘之作。姜广辉认为,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古代民族相比较,在史前各文化阶段上基本是一致的,在文明进程上也差不多是同步的。但是,“中国进入文明的路径和特点却有所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基因”。2002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法国学者施舟人在北京大学汤用彤学术讲座上的演讲稿,命名为《中国文化基因库》,其主要是研究中国道家思想的论著。2003年9月,《河北学刊》以《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与现代传承》为题,发表了王东、胡孚琛、刘军、魏小巍、李宏伟五人的文章,这些文章以文化基因为核心概念,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和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并前瞻中华文明在新世纪如何实现现代传承和发展。许倬云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文集中,对文化基因也开展了讨论。他认为,文化基因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推翻”,并且指出:“文化的基因有助于我们了解一定时空的社会发展。但它却不足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一定时空为什么会有它特殊的发展,若不将时间这个量数加进去,那么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就不会完全。”^①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没有发现中国学者对“文化基因”作出公认的定义,更没有发现关于中华文化基因与中国社会制

^①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2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